执行主编:张天龙 责任编辑:郑璐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henglu59@163.com

漫漫长征路 衣装见初心





上图:红军御寒棉衣。
左图:红军棕皮背心。
均为资料照片

1934年10月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进行战略转移,开始长征。漫漫长征路上,红军官兵以钢铁意志闯过无数生死难关,身上的粗布军装、自制草鞋、羊毛线衣,既是保障战斗生活和抵御严寒的随身装备,更是这段艰苦卓绝征程的鲜活见证,镌刻着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,映照着不怕牺牲、艰苦奋斗的初心本色。

红一方面军——攻坚克难,军民同心保障远征

1934年10月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(红一方面军)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.6万余人,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。

主力开拔前,中央苏区群众全力支前,广泛筹集粮食、被服、斗笠等军需物资,为远征的红军筑牢后勤基础。福建长汀红军斗笠厂生产出20余万顶红军斗笠,保障中央红军出发时基本实现每人一顶斗笠;长汀被服厂每日加班两小时赶制出大批被服,保障了红九军团在开拔前补充薄棉衣、夹被、救护绷带等军需品。同期,福建宁化也在7月至10月的支前突击中,筹集军粮14余万担、草鞋1万余双、军衣1000余套等大批物资,源源不断送往红军各部。

出发前夕,中革军委为每位指战员发放一套新军装。12月初,部队进入湘粤交界五岭地区,翻越老山界时,高寒多变的"十里不同天"气候,让单薄军衣难以抵御刺骨寒意。

面对无后方作战的补给困境,各军供给部保留3至5名缝纫工,配备2台缝纫机,随时为部队修补、制作急需的被装。

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时,经过近3个月连续转战,原有军装大多磨损严重。杨得志同志在回忆中写道:"我们这支队伍,经过长途跋涉,连续作战,由于脱离了根据地,得不到补给,不少人身着夹衣,打赤脚穿着草鞋。一个班十几名战士,所穿衣服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。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……"部队在遵义休整10余天,一方面采购布匹请当地群众帮忙剪裁缝制新军衣,一方面动员战士自己动手制作,同时组织城内被服厂日夜开工,为每位指战员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,勉强支撑后续四渡赤水的御寒需求。此后近9个月的行军中,部队再未得到成批更换军装的机会。

部队进入西康境内后,气温骤降。从南方带来的单衣无法御寒,当地又难买到布匹和棉花。指战员们便就地取材,利用当地出产的羊毛捻线,编织毛衣、毛裤、毛袜等御寒衣物,有效缓解了物资匮乏的局面。翻越雪山前来不及筹备棉衣,有的战士就把两件单衣缝在一起,中间填充破棉絮和干草做成简易御寒衣;有的找来牛羊皮,中间剪开领口、两侧缝合做成皮背心。但绝大多数指战员仍身着单衣单裤,脚穿草编、麻绳编或布条编的草鞋,根本不具备御寒能力。老红军谭发贵回忆道:"我们身上都是单衣,有的还是短裤,脚上穿着草鞋,而且早已破烂不堪。毛主席和我们一样,穿着那身褪了色的灰布军装,脚上穿着布鞋,手里拄着一根棍子,身上背着一块雨布。"

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:"在草地里,不仅道路难走,而且衣食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。衣服方面:我们由江西出发时发了两套衣服,到贵州遵义补发了一套,到此时已快到十个月了。所以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。气候奇寒,大家穿着各种野兽皮,如羊皮、虎皮、驼皮、狗皮……"

1935年10月,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,绝大多数指战员早已衣衫褴褛。聂荣臻同志回忆:"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,而一军团当时尚缺两千多套棉衣补给不上,部队在陕北透骨钻心的寒风中致病送医院的先后达千余人次。"关键时刻,直罗镇大捷为红军及时补给军需,犹如雪中送炭。

红四方面军——就地取材,自制军衣

红四方面军的长征,自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开启,直至1936年10月会宁大会师胜利结束。在此期间,部队有近1年时间在川康边藏区艰苦转战,当地物资基础薄弱,布匹极度稀缺。面对无后方作战的困境,指战员们就地取材,利用当地出产的羊毛、牦牛皮自制毛衣、皮衣;同时兴办小型随军军工厂,组织有手艺的能工巧匠修枪械、打战刀、编斗笠、缝制被服,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,基本缓解了部队的被装供应难题。

在过草地前,红四方面军提前进行必要的物资筹备:一方面发动全体指战员动手编织毛衣、毛裤,明确要求每人随身携带1张羊皮、5根干树枝,同时以连排为单位统一筹备辣椒、生姜、白酒等御寒物资;另一方面在出发前逐人检查行装,要求每人配齐三样基本物资:一是装有3天口粮的粮袋;二是棉衣或毛衣,没有厚衣物的至少备一身单衣;三是每人携带3至5双草鞋。此外,还要做好武器弹药方面的相应准备。第三次过草地时已近隆冬,高原气候酷寒刺骨,当地不产棉花。指战员们便上山割取棕树纤维编织成蓑衣御寒,或是直接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当作贴身背心穿在身上。

长征的艰苦磨砺,让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普遍熟练掌握了打草鞋的技能,还逐步学会了剪制皮衣、撕揉羊皮、捻毛线,以及编织毛衣、毛背心、毛袜子的手艺。1935年6月,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时,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提前筹备了大批慰问物资,其中就包含大量自制的被装品类。

为迎接红二、红六军团到来,红四方面军一方面在藏族群众的支援下筹集采购了大批牛羊,储备充足的粮食物资。另一方面,发起全员织毛衣活动,结合再过草地、顺利北上抗日的御寒需求,给每位指战员分配了织两件毛衣的任务:一件留作自用,保障自身长途行军的被装需求,另一件作为会师礼物送给红二、红六军团的战友,让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也能拿到御寒衣物。

红二方面军——因地制宜,多方筹措解决服装

红二、红六军团(1936年7月改编为红二方面军)的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。长征途中,部队始终要求各单位因地制宜解决衣物补给,适应西南地区复杂多变的山地、高原气候条件。

为保障行军中的被装需求,红二、红六军团专门编有一支五六十人的随军缝工连,配备两台缝纫机,在转战间隙赶制军帽和部分军服。由于沿途难以采购到红军传统的灰布,部队大多就地取用西南当地出产的黑布制作军服。到三大主力会师时,不少战友正是通过辨识度极高的黑色军装,一眼就能辨认出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。

即便有缝工连的全力生产,受艰苦转战的条件限制,全军依然很难做到人人按时领到统一军装,不少新入伍的战士很长时间都没有制式军服。老红军夏精才回忆,1935年初他在贵州黔西参加红军时,身上还穿着破裤子,入伍后很久都没领到新军装,后来打土豪时连队分给他一条绸缎裤子,这条裤子他一直穿到了陕北。

也正是因为物资补给条件有限,长征途中红二、红六军团的指战员装束各有鲜明特点:红六军团的指战员大多是从江西苏区一路转战而来,习惯背着包袱、雨伞,腰上别着饭袋,脚穿布鞋;红二军团的军装样式更不统一,军帽大小不一,指战员们都在身上捆着标志性的红带子,背着斗笠,脚穿草鞋。1936年7月,部队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,红四方面军考虑到这支部队长期转战缺乏御寒物资,特意发动全军动手赶织毛衣,并将其中几十件毛衣、上百件羊皮背心赠送给红二、红六军团。这批珍贵的御寒物资优先发放给了体弱的战士、小战士和女同志,帮大家顺利适应了高原的严寒环境。

时任红二军团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的范子瑜回忆,红军的物资补给基本以缴获为核心,缴获到什么就吃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,每打下一座城镇,后勤机关的首要任务就是采购布匹赶制军帽,蓝布、灰布都能作为制作原料。另外,红军日常穿的草鞋都是用布打的,行军时脚上穿一双,每人背上还要背两双。几乎所有红军战士都掌握打草鞋的手艺,实在不会打的也会请战友帮忙打好两双背在身上。直到长征结束,部队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之后,全军才实现每人发放两套衣服,一套由红军总部统一配发,另一套由部队自行赶制,两套均为灰色制式军装,至此部队的着装才真正实现整齐划一。

漫漫长征路上,一件军衣、一双草鞋,从来都不只是普通的行军装备:它们印着苏区群众连夜赶缝的针脚,藏着战友间推让御寒衣物的温度,也见证了沿途各族群众冒着风险筹送布匹的鱼水深情。红军靠着就地取材、军民同心、兄弟部队互帮互助的力量,扛过了雪山草地的严寒,以顽强意志克服服装补给的极端困难,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服装物件,正是伟大长征鲜活的见证,也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沉淀下珍贵的精神密码。

徐平 来源:《中国国防报》